

社區護理 Community Nursing

收稿日期：2020-07-02

接受日期：2020-09-01

doi：10.6729/MJN.202012_19(2).003

探討影響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張栢菱^{1*} 王慧¹ 張雲¹ 林美盈¹

【摘要】外地家務工作者，亦即移居家務工作者（Migrant domestic workers），遍佈全球，是全球人口遷移現象下的其中一類群體，他們離開原居地，遷移入目的地工作，環境的變化影響著該群體的生活與健康狀況。澳門在聘用外地僱員法律制度下，目前有約三萬名外地家務工作者，面對社會文化和語言的差異，該群體的健康狀況值得關注。故此，本文旨在透過文獻回顧，應用 Dahlgren 及 Whitehead 的彩虹模型，探討影響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本文發現影響該群體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欠佳，包括生活及就業條件、語言及文化適應等，從而提出有利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建議。

【關鍵詞】 移工 健康 社會決定因素

Exploring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Macao

Pak Leng Cheong^{1*} Hui Wong¹ Wan Cheong¹ Mei Ieng Lam¹

[Abstract]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lso known 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spread all over the world under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 population migration. They leave their origin countries and migrate to work at destination countries. Changes in the environment affect the living and health conditions of these people. Und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w on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employees in Macao, there are now about 30,000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social culture and language, the health status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s of great concer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literatures, to explore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the health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Macao through the rainbow model of Dahlgren and Whitehead. It was found that the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of this population are unsatisfactory, including living and working conditions, language and cultural adaption. Thus, this articl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health of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Key Words] migrant workers health social determinants

* 通訊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joecheong@kwnc.edu.mo

¹ 澳門鏡湖護理學院 Kiang Wu Nursing College of Macau

項目資助 Project Funding：澳門高等教育基金 Higher Education Fund of Macao

1 背景

全球國際化的急速發展，造就了遷移人口的持續增長，其中超過一半為移工（Migrant workers），即一個人從一個國家，為就業遷移到另一個國家（Simon, Kiss, Laszewska, & Mayer, 2015）。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估計，目前全球的移工人口約 1.64 億，比 2013 年增加了 9%；接近九成的移工年齡在 25 至 64 歲，接近七成生活在高收入國家，構成高收入國家 18.5% 的勞動力；以上數據反映著愈來愈多富有生命力的群體，向著高收入國家流動（ILO, 2018）。隨著越來越多

移民的動機是為了獲得低技能的勞動機會，移工從原居地進入移居地，後來也會回原居地，這不僅可能與傳染性疾病問題有關，而且有證據顯示，也與非傳染性疾病有關；大多數移工的生活條件增加了健康的脆弱性（如缺乏家庭支持、語言和文化差異）、社會保障不足等，亦使其難以承擔過大的醫療費用，影響健康狀況（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2010）。有學者提出，移工的流動影響著個人和人群健康，對於移工的公共衛生政策，需要整體多段的考量（Zimmerman, Kiss, & Hossain, 2011）。

過去幾十年，由於發達國家的老年化及家庭服務的需求增長，吸引女性移工投入家務工作，目前全球有超過 5,200 萬移工是家務工作者，他們大部分是女性，工作甚至住宿於私人家庭中，從事居家清潔、烹飪、照顧孩子和體弱長者等工作，他們對工作家庭的健康和安全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ILO, 2013, 2020)。由於家務工作者的投入，家庭中的其他婦女才得以進入有償的勞動市場，因此，家務工作者對家庭及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ILO, 2020)。然而，由於全球大部分家務工作者是非正式的勞動力，在移居地的身份特殊，工作未受到基本的保障，使成為了最脆弱的勞動群體之一 (ILO, 2020)。

澳門在聘用外地僱員法律制度下，目前有十九萬多的外地勞工，佔澳門地區就業總人數的一半，當中約三萬名外地家務工作者 (澳門勞工事務局, 2020)，屬正式的勞動力，工作雖然受到一定保障，但目前對該群體健康狀況的了解有限。故此，本文將從文獻回顧，了解外地家務工作者普遍的健康狀況，再透過分析影響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提出有利該群體健康的建議。

2 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現狀

有關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研究，大多集中探討其在移居地的健康狀況。一篇有關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問題的系統性回顧，把納入的 32 篇研究，從四個方面分析，包括不良工作條件與相關健康問題 (15 篇)、心理健康 (11 篇)、傳染病 (3 篇)、健康的知識態度行為 (3 篇)，作者總結提到，很多國家出現的不良工作條件都很相似，例如工作時間過長、生活條件差、缺乏安全設備等，不少研究報告了工作相關的精神壓力及職業健康損害，加上缺乏醫療服務支援，例如求醫時受歧視、僱主拒絕提供醫療支援等，都會進一步損害該弱勢群體健康的狀況 (Malhotra et al., 2013)。

研究發現工作相關的健康問題，在外地家務工作者身上常常發生。一項美國的調查，對象為 150 名外地家務工作者，超過一半的對象曾因工受傷，包括搬運後背痛、切割傷等 (Hanley, Premji, Messing, & Lippel, 2010)；另一項西班牙的質性研究，也有相似的報導，該研究訪談了 46 位外地家務工作者，報告了外地家務工作者在工作中會遭受到不同的健康危害，例如常接觸漂白劑而引起的皮膚傷害，長期勞動而引起肌肉骨骼勞損等 (Ahonen, Jacob, Navarrete, &

Porthe, 2010)。此外，探討外地家務工作者的工作壓力與精神健康的研究亦不少，有研究調查了 247 位在澳門工作的菲籍移工，以家務工作者為主，指出該群體在澳門的適應過程受到不少職業相關的壓力，例如工作中受到過多的監督 (Bernardo, Daganzo, & Ocampo, 2018)；Ahonen 等人 (2010) 也有相似的發現，提到工作中擔任照顧者的情緒負擔、缺乏社會支持、常獨自工作的孤單感等均構成壓力。

有研究報導外地家務工作者的身心健康狀況欠佳。香港一項針對外籍家務工作者的調查，回收了共 2,017 份問卷，發現其生理健康及心理健康平均分數與當地成年人比較為低，反映香港的外籍家務工作者的健康狀況較當地人差；調查分析同時發現，工作狀況會導致較低的生理及心理健康，包括未按時獲發工資、休息日需加班、感到被歧視等 (香港中文大學, 2019)；另一項阿根廷的調查，參與的 199 位家務工作者，以外地家務工作者為主，當中 23% 參與者表示總體健康欠佳，20% 表示過去 12 個月曾遭受語言或身體的暴力對待；調查亦發現居住於僱主家中的家務工作者，其社會支持方面，顯著低於非居住於僱主家中的家務工作者 (Bauleo, van Dijk, & Radon, 2018)。可見外地家務工作者的身心健康狀況，受到生活和工作環境所影響。

3 影響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直至 2020 年 4 月，澳門共有 31,044 名外地家務工作者，主要來自的地區依人數包括菲律賓 (17,216 名)、越南 (6,763 名)、印尼 (4,488 名)、緬甸 (1,751 名) (澳門勞工事務局, 2020)，大部分來自東南亞國家，亦是高遷移人口的國家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2019)。由於外地家務工作者群體的特殊性，面臨著法律、社會、文化、經濟等綜合障礙，這使他們的身體、心理和社會福祉受到威脅，對婦女和低技能移工而言更為嚴峻，故此，移居及其帶來對生活、社會、工作條件的改變，已成為影響移工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 (IOM, n.d)。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繁多，其差異導致健康的不平等，已受國際組織重視，世界衛生組織於 2009 年決議通過針對健康社會決定因素採取行動以減少健康不平等 (WHO, 2009)，國際移民組織也認同影響移工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的重要性，分析並提出全球促進移

工衛生政策的建議 (IOM, 2019)。

有關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的研究和理論模型有不少，較廣泛使用的有 Dahlgren 及 Whitehead 的彩虹模型 (見圖 1)，模型有助探索各決定因素對健康可能帶來的影響，以及各決定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世界衛生組織及國際移民組織也應用彩虹模型分析移工的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從而提出有關建議 (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IOM, n.d.)。事實上，移居本來已是一個重要的決定因素，對移工來說，移居貫穿在整個健康社會決定因素模型中，國際移民組織 (IOM, n.d.) 基於彩虹模型的組成，提出了移居循環 (Migration cycle) 在當中相關的考慮，模型以個體為中心，意思是個體本身擁有影響其健康的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和遺傳因素，其影響健康的程度是相對固定的；中心向周圍發散共有四層：(一) 個人生活因素；(二) 社會和社區的網絡；(三) 生活和工作條件；(四) 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條件。模型亦強調各層因素並非絕對區間，而是互相影響，以下將從四個健康社會決定因素範疇，對澳門的外地家務工作者的狀況作出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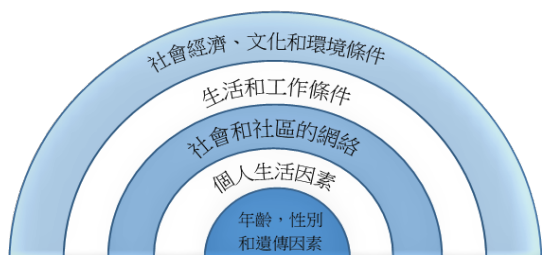


圖 1 健康社會決定因素彩虹模型 (引自 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3.1 個人生活因素

個人生活因素是指可以促進或危害健康的個人生活方式，被認為是可以改變的因素，包括吸煙及體育活動等行為 (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7)。有關澳門外地家務工作促進或危害健康的行為，目前未有發現相關的資料，然而不少研究發現社會人口學因素 (Social demographic factors) 是影響健康行為的主要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教育水平等 (何美坤、劉曉君、毛宗福, 2019)，因素與彩虹模型的中心重疊。對於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的社會人口學因素，參考 Bernardo, Daganzo, & Ocampo (2018) 對澳門外籍移工的調查，以家務工作者為主，顯示 247 名受訪者中，平均年齡

為 35.38 歲，完成中學或以上的教育水平佔九成，女性為主，在澳門受聘年數平均為 3.34 年；史唯 (2018) 的研究亦有相似的結果，可見外地家務工作者普遍為青壯年，具良好的教育水平。

3.2 社會和社區的網絡

社會和社區的網絡是指社區成員的相互支持，包括家庭和更廣泛的社交圈子 (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7)。關於外地家務工作者的社交活動，可觀察到在節假期間，公共休憩空間會見到不少移工聚集，亦會見到移工參與宗教活動，史唯 (2018) 的研究也有如此的報導。此外，澳門社區素有結社的文化，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相關組織亦不少，有報導指不同類型的移工團體達 77 個，亦有不同國籍的聚集點，主要聚集點是售賣原居地產品的小商店 (論盡, 2015)，例如紅窗門的菲律賓商店、荷蘭園二馬路的泰國商店、三盞燈的印尼及緬甸商店等，可見移工在澳門社區具有一定的社交平台，在公共空間的聚集氣氛融洽。除此之外，為更好支援外地移工在澳門的生活，澳門社會服務機構澳門明愛的迎雁軒在政府的資助下，也逐步擴大其服務對象及服務內容，為非中國籍合法居澳人士，舉辦認識澳門文化、醫療衛生常識等活動；開辦廣東話、照顧技巧培訓班等 (澳門明愛, 無日期)。然而，所有外地家務工作者均經歷著離開原居地，離開家庭與親友，移居到澳門工作，在缺乏社會支持下所引申出的各種問題，特別是精神心理狀況值得關注，下面段落將延續探討。

3.3 生活和工作條件

生活和工作條件是指個體維持健康的能力，取決於生活和工作條件、食物供應、獲得基本用品及服務的機會，包括住屋、就業、社會福利等 (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7)。對於外地僱員在澳門就業的權利、義務及保障，受到相關的法律保護，當中包括工作時間、節日假期、住宿、工作意外與職業病保險等，外地家務工作者也受到以上的保障 (澳門印務局, 2009)，但最低工資除外 (澳門印務局, 2020)。目前有關聘請家務工作者的月薪，是由僱主向澳門勞工事務局申報，審批聘請家務工作外地僱員月薪至少為澳門幣 3,000 元 (澳門日報, 2019)。根據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0) 統計顯示，2020 年第一季澳門的外地家務

工作者每月收入中位數為澳門幣 4,300 元，對比過去五年有稍微上升，2016 年第一季外地家務工作者每月收入中位數為澳門幣 4,000 元（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6），但相比澳門法定最低工資按月計算為澳門幣 6,656 元為低（澳門印務局，2020），與 2020 年澳門一人家庭之最低維生指數比較接近，其為每月澳門幣 4,350 元（澳門社會工作局，2020）。

另外，據 2020 年第一季統計，外地家務工作者每週工作時數中位數為 48 小時（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0），近五年沒有明顯變動，對比 2016 年第一季統計，外地家務工作者每週工作時數中位數為 48.5 小時（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16）。從整體就業統計數據中發現，外地家務工作者是就業統計各工種中，工作時數最多，月薪最低的職業（澳門統計暨普查局，2020）。此外，外地家務工作者具有住宿權利，若僱主以現金支付在外留宿，每月給付的金額不得少於澳門幣 500 元（澳門印務局，2009）。對於目前較低的工作條件，有外地家務工作者團體向政府表達訴求，特別是住宿津貼的金額，以目前經濟環境，難以租到安全衛生的地方（論盡，2019a）。

不良的生活及工作條件，為健康帶來負面的影響，有報導指，外地家務工作者因家務工作繁重，影響睡眠時數及質量（論盡，2019a）；亦有研究關注澳門菲籍家務工作者的精神健康，對澳門 22 名菲籍家務工作者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指出，菲籍家務工作者面對著不同的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焦慮）和成癮行為（如賭博、酒精濫用），指出在不良的工作條件下，如缺乏隱私、超時工作及歧視，加上承擔著勞務代理費及匯款養家的財務壓力，缺乏社會支持，都是菲籍家務工作者在澳門普遍經歷的壓力來源（Hall, Garabiles, & Latkin, 2019）。此外，由於澳門的官方語言為中文及葡文，面對語言差異，澳門的外籍家務工作者也曾被報告，語言問題是阻礙醫療服務獲取的重要原因（Hall, Garabiles, & Latkin, 2019）。可見目前澳門的外地家務工作者生活及工作條件較低下。

3.4 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條件

社會經濟、文化和環境條件是指影響整個社會普遍人口健康的中介因素，包括城市化、流動性、文化價值觀、重大社會變化等（Dahlgren & Whitehead, 2006;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3）。澳門

自 2002 年賭權開放後，經濟發展迅速，在勞動力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大量移工進入澳門，改變了澳門原本的勞動市場結構，亦為澳門原本的公共環境帶來改變（史唯，2018），這是一個互動的變化，移工既擁有著自己民族的文化特質，亦要適應移居地的文化、語言、習俗等，過程可能是正向或負向（Bernardo, Daganzo, & Ocampo, 2018）。從澳門不同的媒體搜索與外地家務工作者相關的報導，發現大多是較負面的報導，不論是僱員方面或僱主方面，不少還涉及侵犯及犯罪（力報，2019b, 2020a, 2020b）。雖然可能是個別例子，然而社會上有不少關於進一步立法規管外地家務工作者的討論，例如職前培訓、提交原居地刑事紀錄證明、設立家傭資料庫等（力報，2019a；澳門日報，2020）。

此外，對於外地家務工作者不適用於澳門《僱員的最低工資》法案，社會和外地家務工作者持兩極意見（論盡，2019a；2019b），可見目前澳門的外地家務工作者在澳門社會環境中，似乎在較弱勢的位置（史唯，2018）。雖然移工受到不平等待遇，在各國各地並不鮮見，且澳門的移工有相關的勞動法例保障，然而在經歷社會不平等的環境下，例如貧窮及排斥，移工的身心健康將受到負面的影響（Virupaksha, Kumar, & Nirmala, 2014）。

4 建議

目前澳門針對外地家務工作者的政策較多集中於其聘請及職業制度上，對於健康促進的政策較少。世界衛生組織就移工的健康，建議制定有關的公共政策，投入資源在語言支援，透過教育、健康推廣活動及資訊科技等方式倡導健康素養（WHO, 2018）；以丹麥為例，當地推行的移民及整合政策改革，包括學習當地語言、深度介紹當地的市政服務、提供教育及訓練、改善醫療服務的可及性及平等性等，雖然未有報導指該政策對健康帶來直接影響，但有指出該政策有助移民融入當地的生活，有利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Careja & Jönsson, 2016）。

綜合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建議：（一）展開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相關的研究，以更進一步了解該群體的健康狀況；（二）提高健康資訊覆蓋面，資訊以不同語言顯示，保障來自不同國家的外地家務工作者能接收及使用健康資訊，減少具風險的健康行為；

(三) 推動外地家務工作者友善計劃，認同外地家務工作者的貢獻，增加其生活及工作的支援。

5 限制

因社會決定因素所涉及的内容繁多，加上有關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的研究報導較少，故本文的分析受到一定限制。此外，有學者指出，由於遷移過程本身是複雜的動態變化，研究只從移入國的角度探討，可能會忽略了原生地對該人群的影響（張書銘，2019），而外地家務工作者在澳門大多屬於短暫性移居，且有關的資料較缺乏，對於原生地的影響，未有納入在是次的探討中。

6 總結

澳門在聘用外地僱員的法律制度下，有限度地容許移工在澳門工作，依法受聘成為外地僱員，多年來，來自各國的移工已成為澳門重要的勞動力，而當中的外地家務工作者，對澳門的家庭及社會經濟發展默默地作出貢獻，是社會發展的成員之一，但有關該群體健康相關的研究不多。為此，本文透過 Dahlgren 及 Whitehead 的彩虹模型，探討影響澳門外地家務工作者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發現該群體較低下的生活及工作條件、語言及文化差異等，可能影響著其身心健康。

參考文獻

- 力報 (2020 年 5 月 27 日)。菲女詐騙 5 尼泊爾男 11 萬。取自 <https://www.exmoo.com/article/149752.html>
- 力報 (2019a 年 2 月 13 日)。社諮委促完善資料審查。取自 <https://www.exmoo.com/article/95979.html>
- 力報 (2019b 年 8 月 9 日)。緬甸女難忍性侵犯報警求助。取自 <https://www.exmoo.com/article/119099.html>
- 力報 (2020b 年 5 月 28 日)。司警拘一狼狽印傭控性侵犯。取自 <https://www.exmoo.com/article/149793.html>
- 史唯 (2018)。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何美坤、劉曉君、毛宗福 (2019)。健康相關行 影響因素。《中華流行病學雜誌》，40 (3)，366-370。
- 香港中文大學 (2019 年 2 月 13 日)。中大人口遷移與流動研究中心發布「香港外籍家庭傭工問卷調查結果」。取自 https://www.cpr.cuhk.edu.hk/tc/press_detail.php?id=2973&t=%E4%B8%AD%E5%A4%A7%E4%BA%BA%E5%8F%A3%E9%81%B7%E7%A7%BB%E8%88%87%E6%B5%81%E5%8B%95%E7%A0%94%E7%A9%B6%E4%B8%AD%E5%BF%83%E7%99%BC%E5%B8%83-%E9%A6%99%E6%B8%AF%E5%A4%96%E7%B1%8D%E5%AE%B6%E5%BA%AD%E5%82%AD%E5%B7%A5%E5%95%8F%E5%8D%B7%E8%AA%BF%E6%9F%A5%E7%B5%90%E6%9E%9C

- 張書銘 (2019)。《越南移工：國家勞動輸出政策及其社會發展意涵》。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論盡 (2015 年 10 月 21 日)。澳門有個「小菲國」。取自 <https://aamacau.com/2015/10/21/%E6%BE%B3%E9%96%80%E6%9C%89%E5%80%8B%E3%80%8C%E5%B0%8F%E8%8F%B2%E5%9C%8B%E3%80%8D/>
- 論盡 (2019a 年 5 月 9 日)。望調升薪酬福利家傭如是說……。取自 <https://aamacau.com/2019/05/09/%E6%9C%9B%E8%AA%BF%E5%8D%87%E8%96%AA%E9%85%AC%E7%A6%8F%E5%88%A9%E3%80%80%E5%AE%B6%E5%82%AD%E5%A6%82%E6%98%AF%E8%AA%AA%E2%8B%AF%E2%8B%AF/>
- 論盡 (2019b 年 10 月 22 日)。家傭不受最低工資保障，議員無意見，陳澤武：可能佢哋屋企都有請家傭啦……。取自 <https://aamacau.com/2019/10/22/%E5%AE%B6%E5%82%AD%E4%B8%8D%E5%8F%97%E6%9C%80%E4%BD%8E%E5%B7%A5%E8%B3%87%E4%BF%9D%E9%9A%9C-%E8%AD%B0%E5%93%A1%E7%84%A1%E6%84%8F%E8%A6%8B-%E9%99%B3%E6%BE%A4%E6%AD%A6%EF%B8%B0%E5%8F%AF%E8%83%BD/>
- 澳門日報 (2019 年 7 月 27 日)。家傭申報月薪升至三千，勞局：兩千僱主未回覆。取自 https://h5.newaircloud.com/detailArticle/8191082_10621_aomen.html?source=1
- 澳門日報 (2020 年 5 月 29 日)。社諮委促研獨立外傭法。取自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20-05/29/content_1437496.htm
- 澳門印務局 (2009)。第 21/2009 號法律聘用外地僱員法。取自 https://bo.io.gov.mo/bo/i/2009/43/lei21_cn.asp
- 澳門印務局 (2020)。第 5/2020 號法律僱員的最低工資。取自 https://bo.io.gov.mo/bo/i/2020/17/lei05_cn.asp
- 澳門明愛 (無日期)，檢索日期 2020 年 5 月 14 日。迎雁軒。取自 <https://www.caritas.org.mo/youth-and-community-service/205>
- 澳門社會工作局 (2020)。經濟援助。取自 <http://www.ias.gov.mo/ch/swb-services/individual-and-family-service/financial-assistance>
-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16)。就業調查。取自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eaf13028-43a3-4cc2-87b7-e3bf354598e7/C_IE_PUB_2016_Q1.aspx
- 澳門統計暨普查局 (2020)。就業調查。取自 https://www.dsec.gov.mo/getAttachment/ccce3444-5e48-4c47-8392-37b0c7b590b3/C_IE_PUB_2020_Q1.aspx
- 澳門勞工事務局 (2020)。按行業及所持身份證明文件的發出國家/地區統計外地僱員人數。取自 https://www.dsai.gov.mo/download/pdf/statistic/nrworker/A1/A1_2020_04.pdf
- Ahonen, E., Jacob, M.J.L., Navarrete, M.V., & Porthe, V. (2010). Invisible work, unseen hazards: The health of women immigrant household service workers in Spain. *American Journal of Industrial Medicine*, 53(3), 405-416.
- Bauleo, M. F., van Dijk, F., & Radon, K. (2018). One's workplace, other's home? Work and health of domestic workers in Argentina. *Annals of Global Health*, 84(3), 450-458. doi:10.29024/aogh.2311
- Bernardo, A.B.I., Daganzo, M.A.A. & Ocampo, A.C.G. (2018).

-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ell-being of Filipino workers in Macau: Consequences for self-esteem and heritage culture detachmen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39, 277-292.
- Careja, R., & Jönsson, H. V. (2016). Denmark: Immigr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and health outcomes. In Raphael, D (Eds.), *Immigration, public policy, and health: Newcomer experiences in developed nations* (pp. 247-272). Canada: Canadian Scholars' Press.
- Dahlgren, G., & Whitehead, M. (2006). European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social inequities in health.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18/103824/E89384.pdf?crazycache=1
- Hall, B., Garabiles, M., & Latkin, C. (2019). Work life, relationship, and policy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Filipino domestic Workers in China: A qualitative study. *BMC Public Health*, 19(1), 229.
- Hanley, J., Premji, S., Messing, K., & Lippel, K. (2010). Action research for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domestic workers in Motreal: Using numbers to tell stories and effect change. *New Solutions*, 20(4), 421-439.
- Institute of Medicine (2003). *The Future of the Public's Health in the 21st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doi.org/10.17226/10548>.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3). Domestic worker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an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extent of legal protec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18). New ILO figures show 164 million people are migrant workers.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newsroom/news/WCMS_652106/lang--en/index.htm
-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2020).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www.ilo.org/global/topics/labour-migration/policy-areas/migrant-domestic-workers/lang--en/index.htm>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2019). World migration report 2020.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publications.iom.int/system/files/pdf/wmr_2020.pdf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n.d.). Social Determinants of Migrant Health.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www.iom.int/social-determinants-migrant-health>
- Malhotra, R., Arambepola, C., Tarun, S., de Silva, V., Kishore, J., & Østbye, T. (2013). Health issues of femal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and gray litera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Health*, 19(4), 261-277. doi:10.1179/2049396713Y.0000000041
- Public Health England (2017). Health profile for England: 2017 Chapter 6: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health-profile-for-england/chapter-6-social-determinants-of-health>
- Simon, J., Kiss, N., Laszewska, A., & Mayer, S. (2015). *Public health aspects of Migrant health: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on health status for labour migrants in the European Region*. Copenhage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 Virupaksha, H. G., Kumar, A., & Nirmala, B. P. (2014). Migration and mental health: An interface.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biology, and medicine*, 5(2), 233-239.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9). Sixty-second world health assembly, commission on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A62/A62_9-en.pdf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0). *Health of migrants—the way forward. Report of a global consultation*. Genev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18). Health promotion for improved refugee and migrant health technical guidance.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www.euro.who.int/__data/assets/pdf_file/0004/388363/tc-health-promotion-eng.pdf?ua=1&ua=1&crazycache=1
- Zimmerman, C., Kiss, L., & Hossain, M. (2011). Migration and health: A framework for 21st century policy-making. *PLoS Med*, 8(5). Retrieved 13 May, 2020, from <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med.1001034>